

漫漫求学路——纪念中国恢复高考40年

(一) 从牧民、农民到工人

本报特约撰稿人：珞珞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1966年我初中毕业，准备考高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之后两年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中，我们作为中学生经历了狂热、压抑、疑惑和失落。1968年7月，在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下，我从北京到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插队，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开始时我们男女知识青年分别住在两个蒙古包里。很快我们中的大多数分散到了不同的畜牧组，下包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到牧民家负责放牛，后来又又在放牧之余义务兼做牧民的保健服务，送医送药，类似于后来被称作赤脚医生。我们深爱草原的壮美辽阔，但是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对我们也是考验。年轻人的激情和建设边疆的光荣感在精神上支撑着我们，牧民的关怀和友善温暖着我们，牲畜业的经济收入也让我们生活过得去。

雁北山阴县短暂的农民生活

两年半后因为生病不再适应高寒气候，我转到姐姐所在的雁北山阴县插队。我们住的房子叫窑，用土坯垒的墙，土坯砌的弧形房顶。山阴是雁北最穷的县，盐碱地上收成低，经济落后。村里没有什么大牲口，拉碌碌碾场子都用人力。有一年村里壮劳力一天十分工挣八分钱，女劳力六分工只挣到四分八，口粮基本全是粗粮。当时农民想搞点自留地副业，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少人半年在村里种地，半年出去逃荒要饭。

村里的女知青都是姐姐原来的同学，我们相处很好，虽然劳动生活艰苦，倒没有了在内蒙时的孤独感。上半年我住在村里，锄玉米地，修从桑干河引水浇地的高灌站，也当民工修公路。下半年被招到县排球队集训，之后随雁北专区队参加省联赛。排球队员都来自北京知青，教练是下放到雁北农村的原省队教练。我们的训练很正规，比赛成绩也不错，得到全省第三名。前两名为太原市铁路局和工厂的球队。他们拥有数名由省排球队下放的老队员，人高马大，所向披靡。

赛事结束后排球队解散了，我要回村时家里希望我转陕西省插队。母亲的院校在文革中从北京搬到了陕西。大学不招生了，教职员在新校址搞运动，批来斗去。母亲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免不了天天挨批，健康

每况愈下。家里希望我到陕西就近照顾母亲。

到西安建材厂当工人

家里辗转托远亲找到了长安县杜曲公社，公社同意接收我插队落户。我的农村户口转到了杜曲，却在分配村庄时遇到了麻烦。老乡们好不容易把知识青年都送走了，不想再要一个分掉他们口粮的。我忽然第一次知道知青在农民眼里并不是香饽饽，顿时失去了作为知青的光荣神圣感。没有村子接收我让公社书记很为难，叫我先在公社住下等消息。

碰巧那天西安建材厂的两位师傅到农村招工，也住在公社。他们知道我是北京知青，会打排球，认为我学篮球会很快，就动员我到他们厂工作。同时也说明招工名额只有普工。那两年大搞群众体育运动，建材厂刻意在招工中寻找队员加强新成立的女子篮球队。

我当时的处境十分尴尬，户口悬在半空。如果进厂当工人，有了工龄和一份工资，公社也没有了麻烦，我就势同意了进工厂。三年半的知青生活戏剧性地就在杜曲公社的院子里结束了。

1971年底我作为普工走进西安建材厂。普工是劳力工，和技术工种不同不需要学徒期，进厂直接拿40元1角。这对我和我动荡中的家庭是好事。

西安建材厂座落在西安市东郊30多里外，离荒寂的小镇灞桥一站地。灞桥的名气来自盛唐长安八景之一的“灞桥烟柳”。每到春天成团的柳絮铺满灞河两岸，像飘渺的青烟。但是在文革动乱时期无人去灞桥观景抒情。

建材厂院墙被农田包围着，像一个远离城市的孤岛。它的前身是砖瓦厂，因为要就地取土烧砖，所以厂区很大。取土剩下的大坑和闲置了的轮窑占了不少地方，其它空地上不是荒草丛生，就是种上了麦子。厂里的三个车间都相距很远。

我们单身职工宿舍是座三层的简易楼，在厂门西侧。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为了节省钢材和木材人们发明了挂钩砖。宿舍楼三楼房间的屋顶呈弧形，是完全用挂钩砖砌起来的，像窑洞顶。厂里另一个大跨度挂钩砖建筑是仓库。我进厂正好当小工，向它高高的弧形吊顶上运送灰浆。

女工单身宿舍占据了二楼的半层。其中技工都来自西安市的知青或文革后的

应届高中生，她们在机修车间或油毡车间工作。普工来自西安郊区的农家，在耐火车间工作。

建材厂机修车间里车钳铣刨电，电焊工俱全，负责

全厂设备加工维修。我的同宿舍室友徐静是机修车间的铣工。她是我篮球队队友。油毡车间的厂房在厂区西头。油毡纸胎的大卷被挂在机器轴上一路拉去，经过滚烫的沥青锅挂料，再经过烘干，冷却，喷粉防粘，最后一个个成品油毡卷被送往成品库房。刮西风时浓烈的沥青味道横扫厂区，灌满宿舍楼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盖的仓库很快封顶了，我被分配到耐火车间粉碎房当干碾机的操作工。耐火车间的产品是炼钢炉内衬用的高温耐火砖，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我是全车间唯一的北京知青。

我们是白班，夜班两班倒，每周工作六天。我们把石料从露天石料场用架子车拉到机房，添料到干碾机里。听着钢碾破碎石料的轰鸣声，嗅着空气里弥漫的粉尘，看着碎料从碾盘上的小孔漏下，再从提升机送到分料筛。筛出的粗砂返回干碾机，细料落到架子车里。装满一车，我们就拉到耐火砖的备料库房卸掉。操作间隙中工友们坐在一起聊天，发呆，劳动的辛苦和环境的恶劣在说笑中就被冲淡了。

工厂有防尘口罩，但是戴上后憋气，所以大家全都戴一般的纱布口罩。上班后不久口罩上就吸满了石粉。眉毛、眼睫毛、鼻侧、耳窝和工作帽下露出的鬓角都落满粉尘。大家经常看着各自的鬼脸，互相取笑。工余洗脸，鼻腔里不乏细腻的白色粉末。粉碎房的职业病是矽肺。

70年代初工厂无一幸免地都被文化革命的洪水裹挟着。批林批孔，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抓革命促生产，运动一波接一波。我们下层的工人远离权力中心，工作上虽然劳累，政治上相对安全。但是在我平静的外表下埋藏着的是一颗无比忧虑的心。

当时在教育界清队整肃运动紧锣密鼓。我母亲的系总支书记是走关系从故宫博物院调去的，没有知识，只抓政治，



恢复高考三十年时，77/78级送给母校的礼物

老教师都是她批判的对象。我妈妈性情耿直，办事认真，又不趋炎附势，成了她的斗争焦点。私下里很多老师和工友同情妈妈，暗中帮她，但是上层组织力量带给她的是与日俱增的压力。

我总是在白班结束的周六晚上去看70里地以外的母亲，再于周一下午夜班前返厂。开始时我乘公交车往返，但是交通系统无比混乱，时间没办法掌控。长途汽车一到，等得不耐烦的人群就像潮水一样涌过去，我很难挤上车。为了能保证周一上班不迟到，我就改骑自行车。去母亲那里，除了给她生活上的帮助，主要是给她精神上的安慰，有时甚至要帮她写检查材料，让她能够稍事休息。她的情况实在不让人放心。

在工厂我工作中尽职尽责。看到我表现不错，车间想吸收我入共青团，派人到我母亲单位外调。他们得到的是关于我母亲和我本人的负面材料。车间领导和外调人员认为评价不实，不予理睬，还是让我入了团。一个没有人过团的人当时会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落后青年而受到政治上的歧视。社会上鱼龙混杂，环境险恶，但是我遇到朴实理性的车间领导和友善的工人伙伴，我只有感恩。

我在建材厂偏安一隅，但是我不认为那里是我的最后归宿。前面的路我看不清，只有本能地做好当下的自己。除了努力完成生产任务，我尽量熟悉设备的结构，学习机器的维护保养。工作之余能找到什么书我就学什么，包括复习我的初中课本和英语。没有具体的方向，没有既定的目标，未来的一切都在混沌之中。可是学习到的知识总有一天是有用的，我需要准备好自己，寻找转变的机会。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